

日本企业档案

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背景

[日] 小林英夫 著

李洪权 译

刘金才 校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企业档案

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背景

[日]小林英夫 著
李洪权 译
刘金才 校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31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企业档案/[日]小林英夫著;李洪权译,刘金才校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9

ISBN 7-301-05148-4

本书日文版由日本经济评论社于2000年3月出版

I. 日… II. ①小… ②李… ③刘… III. 企业管理—经验—日本 IV. F27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9018号

书 名: 日本企业档案

著作责任者: 小林英夫

责任编辑: 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148-4/F.0444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6

电子信箱: wzhuge@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200千字

2001年9月第一版 200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00元

序章 研究课题与方法

一、课题

本书的研究课题在于,通过考察日本企业在战后亚洲开展的活动,展现日本与亚洲工业化进程的历史轨迹,探讨日本企业究竟在亚洲地区工业化历史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论证 1997 年 7 月亚洲金融危机给日本企业的运营所带来的影响,可说是必要的前提性研究工作。

二战前,日本企业在朝鲜、台湾地区、“满洲”(本书中的“满洲”是一个历史概念,指伪满洲——译者注)中国本土以及东南亚等殖民地和占领区,建立了工厂并进行了相应的企业活动。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使这些企业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日本宣布投降之日起,日本人开始整体撤回本国。其在殖民地和占领区建立的工厂,全部归属到了进驻这些地区并解除日军武装的联合国军队的管辖之下,进而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后又转移到了这些新生国家的手中。之后,这些工厂在各国的不同条件下经历着不同的命运。

当然,撤回本国的日本人对包括不得已而弃留在国外的工厂

在内的资产,提出了赔偿要求。然而,在和谈正式开始以前,他们的要求被联合国军拒绝而搁浅。至于掀起赔偿运动,则是在和谈生效以后。不过,在他们撤回不久就展开的有关“在外财产”的调查(《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历史的调查》),虽然没有直接对赔偿运动产生作用,但对于清理他们在战前的企业活动,以及确认其在这些活动中作为当事人的意义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企业在亚洲地区重新开展活动,是在1951年日本同联合国签署媾和条约以后。但是,在此之前,围绕战后处理问题,抑或在联合国管辖的贸易之下,日本的贸易公司或企业就已经进入亚洲,并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企业活动。在媾和条约缔结前后的50年代,日本企业的主要活动舞台,是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如今被称为南亚和东盟的东南亚等地区,而不是战前日本所注重的中国东北、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战后日本企业的活动舞台同战前迥然相异。到了70年代,随着日本企业活动舞台的扩大,新的活动区域也和以前的营业活动地区开始出现重合。但在50年代日本开展海外企业活动之初,那些承担着未来发展使命的年轻的商业精英们,都把开始活动的舞台放在了今天的南亚,即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

1952年对日媾和条约生效以及此后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有关赔偿问题的解决,为实现这些国家同日本建立邦交关系、重新正式开始贸易以及日本企业向东南亚地区扩展,提供了契机。1955年同缅甸达成赔偿协议,以及此后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越皆达成赔偿协议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日本企业这种由南亚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应该说与印度经济出现阴影不无关系。印度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虽然意在

推动印度的重工业化,但因此轻视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粮食和日用品紧缺,并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徘徊不前。因而进入60年代后,日本企业把希望转移到了那些达成赔偿协议并实现了邦交关系正常化的东南亚各国这样一些新的市场。

日本通过1955年开始的对东南亚的赔偿,把这些地区变成了日本企业活动的阵地。50年代的赔偿,到了60年代又以贷款的方式延续下来,从而使得该地区成为日本企业的活动中心。

此外,进入60年代,日本企业活动的舞台进一步扩展到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洲大陆在内的亚洲太平洋地区。1965年后越南战争爆发,日本对亚洲国家的贷款也随之与越南战争纠缠在一起,增加了新的项目。

70年代日本企业的活动范围,除了已有亚太地区以外,又新增了欧洲地区,从而呈现出了全球性色彩。同时,1972年日元开始升值(汇率提高),日本企业除了从事以往的贸易活动外,也开始了新的直接投资。在70年代前半期,日本企业的直接投资活动中心在亚洲,后半期扩大到了欧洲。进入80年代,为了避免发生贸易摩擦,日本企业扩大了在美国的活动。到了90年代,随着日元不断升值,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活动,包括中小企业在内规模越来越大,在地域上也由东盟地区扩展到了中国、越南等国家。

然而,日本企业向海外的业务扩展活动,虽然以东南亚为中心扩大了规模,但其主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制造行业为主,金融机构的扩展势头还非常薄弱。直到进入80年代日本的银行才向海外扩展。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日本在东亚地区经营体系的弱点。此前在东南亚的日资企业,都是在基

于“盯牢美元”(Dollar Peg)的模拟“稳定”外汇市场的前提下而实行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因而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外汇市场剧烈波动,使其在东南亚的活动也从根基上产生了动摇。在外汇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的形势下,以高质量著称的日本生产技术也不不得不对其体系进行调整。那么,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日本企业今后应该建构什么样的新体系呢?这正是今后的一大课题。

本书希望通过考察日本企业从战后至今在亚洲活动的轨迹,探明这种企业活动所创建的亚洲生产网的特征,并同时探究此次金融危机问题的本质。

二、日本式经营的展开

一般认为,从整个亚洲范围来看,日本同周边国家之间的企业活动,在战前和战后是具有连续性的。战败后的日本人从亚洲其他国家撤退时,留下了大量的日本技术和传统。战败后亚洲国家对日本技术人员的继续留用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从地域上来看,战后日本企业的活动同中国东北、韩国以及朝鲜等战前的中心地区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断绝,而同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在战前与战后却有着连续性的关系。从战后重新开始的对东南亚贸易来看,日本企业的活动很多都是依靠战前已有的人际关系或是通过恢复以前的分店而开始的。举例来说,1956年打入印度的朝日玻璃公司就是在依靠战前的人际关系重新开始活动的,武田制药公司1962年进入台湾,也是在原有的工厂和人员的基础上重新开张的。不仅工厂,50年代日本对印度的铁矿石开发也不例外。例如1951年以后

岸本商会对印度果阿铁矿石的开发和进口,追根溯源,就是始于岸本商会同巴德商会之间的战前关系。再如1952年后从菲律宾宾拉拉普矿山进口铁矿石,也是基于石原产业在战前及战争时期与岸本商会的关系而重新开始的。

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赔偿项目与企业之间的相关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企业与战前在技术方面的连续性和在地域上的间断性。例如在赔偿业务中大显身手的海外建设信息咨询公司——日本工营就是如此。日本工营从1955年开始从事对缅甸的赔偿业务,而后又着手东南亚各地的赔偿业务,其主要业务是从事电力开发事业。该公司总经理久保田丰,1926年到1945年间在日本氮气公司总经理野口遵手下工作时,就一直在朝鲜、“满洲”从事电力开发,这成为其战后发展的基础。战后久保田引以自豪的,是其采用了国际十分通用的开发方式,即“通过改变流域而获得大流量、高落差的工程方法,以及通过上游建拦河式水电站、下游筑堰坝式水电站而对同一条江河进行有效开发”的开发形式。这种方法的最初实施地就是朝鲜和“满洲”。如果说战前和战后有所不同的话,那只是开发的对象地点由东北亚转移到了东南亚而已。

当然,这与战前任“满洲国”产业部副部长期间充分展露才华的岸信介不无关系。因为他在经过战后被解除公职之后,1956年又出任外交部长,尤其在1957年任首相后一直重视对东南亚地区的开发。由久保田和椎明悦三郎等人所构成的“满洲”派,是岸信介所依靠的主要力量。

如前所述,战前和战后日本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活动,在技术方面存在连续性,而在地域上却存在着间断性。其中,尤以“劳动惯例”最为明显。例如70年代日本企业正式打入东南亚时,

日本公司所采用的“劳动惯例”就是战前体系。1974年1月田中总理大臣访问东南亚时发生的反日暴动,就是源于对这种“劳动惯例”的不满。反日运动的口号之一是“录用当地人”,也并非事出无因。因为海外日本企业的“劳动惯例”,是在论资排辈的基础上,自战前就建立起来的以日本人为中心的“劳动惯例”,它在正式打入东南亚数年后遭到了当地人的抵抗。从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日本企业也采取了以“融入当地”、“为当地做贡献”、“录用当地人”等为代表的与当地相融合的诸政策,并在实际做法上进行了部分调整,但作为日本经营核心的以日本人为中心的“劳动惯例”,至今仍无本质性改变。

如果说70年代以来亚洲经济的成长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话,那么从根本上对这种制造业起支撑作用的无疑是日本企业。而且,仅就制造业而言,虽然它已经发展为具有亚洲特色的模式,但仍保留着浓厚的日本式经营的痕迹。并且,亚洲各国的日本式经营,都是通过以模拟稳定外汇市场的“盯牢美元价制”为支撑的贸易体系,而构成“东亚经济圈”的。

三、对研究史的评析

1997年7月开始的金融危机,从金融、汇兑方面使这种“稳定的”亚洲生产体系发生了动摇。

在90年代后半期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各种讨论中,最欠缺的部分就是对作为危机发源地的亚洲地区的工业化历程及其特征的分析。如前所述,迄今为止在亚洲,是由日本主导建立起了以生产为“主”、金融为“从”、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的。而此

次金融危机,迫使上述结构必须快速向以金融为“主”、生产为“从”的体系转换。而且,很多学者在论及199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时,也都把议论的焦点集中在了这个为“主”的金融体系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功过问题上。

强调其“功”的代表,可以举出IMF、OECD和美国财政部等。他们的看法,概而言之,即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过早地实行经济自由化而未能建立起稳固的体系所致。他们主张应当早期实施限制的缓解。日本方面比较明确地支持这种观点的是竹中平藏。他在以《日本贤国论》为代表的许多著作中,都呼吁推进缓解限制的做法。^①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是对以IMF为代表的论点的进一步延伸。

关于“过”,首先应当提到鲍尔·克鲁格曼,他指责IMF的政策并不符合亚洲的实情。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中指出,由于亚洲的经济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因而不能具有持续发展性。面对这次金融危机,他对IMF持批判态度,认为将IMF运用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是一种错误。^②同样对IMF持批判态度的还有詹弗利·萨克斯,他认为IMF的做法是掐掉了发展中国家刚刚成长起来的嫩芽。^③至于主张市场开放、实行自由竞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更是严厉地谴责IMF的做法背离了自由竞争的原则,认为IMF应当解体。^④即使是被人们称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主角的乔治·索罗斯,也在他的著作《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中指出,IMF的过分做法必然暴露出全球资本主义本身的破绽。^⑤

的确,IMF的做法存在很多问题。即使同在亚洲,不同国家也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国情,而IMF对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

进行资金援助的条件几乎完全一样。众所周知,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不论是在经济规模上还是在发展阶段上都相去甚远。因为,韩国被认为是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NIES)之一,是加入OECD的发达国家,而泰国则是今后将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国家。至于印度尼西亚,则是立志今后赶上泰国的落后国家。这三个国家不仅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而且经济、社会体系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将这些国家不加任何区别,反映出了欧美政策制定者的思维不切合亚洲实情的弊病。

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对亚洲实际情况的认识不足。尤其是在对亚洲工业化特点的认识上存在致命的弱点和不足。为了解决这一大难题,笔者打算从历史角度出发对现状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并不把视野限定在1997年夏天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一点上,而是将此前发生的一系列动向,一律放到战前、战后的亚洲工业化进程中去观察,然后探讨为什么在亚洲工业化进程中沒有孕育出与自身相适应的金融机构。如果考虑到此次金融危机是发生在作为日本企业海外活动舞台的东亚、东南亚地区,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企业的活动及其特征。

日本打入亚洲的主力产业是制造业,银行正式打入该地区是在企业打入的十年之后,即80年代的事情。这期间,为日本企业筹措资金的是与这些企业同步进入东南亚的日本商业公司。日本企业在资金、商贸以及信息网络方面与这些商业公司相对而独立出来,也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至于日本企业在打入东亚、东南亚过程中为何要如此过分地依赖于商社,原因自然有很多,但是日本企业在打入海外之初就与出口业紧密结合,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日本企业在打入海外之初采取的是出

口的形式。这种情况大大提高了商业公司的介入比重,但相反却推迟了银行业的打入。我认为日本企业在打入亚洲过程中的这一特点是导致该地区金融基础结构脆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本书在讲述这一点的同时,还将追溯日本企业打入东亚、东南亚的历史,从而逐步勾画出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

的确,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了对 IMF 政策是非“功”、“过”的论争。前者的“功”可说是基于新古典派的立场而主张市场原理的彻底化,而后者的“过”则是主张其限制的必要性和强调国家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也许可以将其视为“市场”与“国家”的对抗。

但是,“功”与“过”的论法都有其不足之处,即这里忽视了一个问题——从亚洲制造业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日本根据类似稳定外汇兑换制度——“盯牢美元制”为后盾的贸易体系,制造出了堪称以日本式生产体系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圈”。日本汽车行业的 BBC、AICO 方案就是如此。所谓的 BBC、AICO 方案,是指日本汽车行业在东盟各国实行分工体制而形成的汽车零部件供应体系。然而,1997 年 7 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却从金融、汇兑两方面打破了这种所谓“稳定的”亚洲生产体系。若论“功”与“过”,则有必要从亚洲制造业的这种变异来进行讨论。然而,人们在讨论亚洲金融危机时,虽然论及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与变异,却几乎没有涉及亚洲生产体系的特征及其历史过程。有例为证,即便是积极论“过”的鲍尔·克鲁格曼,也把亚洲工业化与高速发展的制造业的特征,理解为 50 年代苏联那种基于大量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经济模式的翻版,而对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日本海外制造

业变化过程的具体论述非常之少。^⑥这也是本书之所以要重点讨论日本制造业在亚洲地区发展过程的原因所在。^⑦

并且,如果说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其与东亚传统体系间对抗与重组动向的话,那么对历史前提的考察就更是不可或缺的了。

本书拟按如下结构来探讨日本企业同亚洲的关系。

第一章,讨论40年代末之前日本企业从亚洲地区撤退及其业务清算状况。二战结束时,大约有民间人士300万、军人及军属300万,即共计600万日本人生活在海外。而他们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半数以上都撤回了日本。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技术人员继续留在当地,负责维护一些被封锁了的日本企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也在40年代末撤回了日本。多数日本人一回到日本,就掀起了要求偿还在外财产的运动。然而这个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却是在进入60年代以后。在这种运动开展的初期阶段所编写的《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历史的调查》,反映了在殖民地生活过的人们的历史观。

第二章,探讨50年代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活动状况。这一时期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重点是印度,后期的重点则转向了东南亚。50年代前期,由于印日感情相对较好、经济形势也比较稳定,加上当时印度也被确定为科伦坡计划的据点,因此,日本企业与印度之间结成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其中,确保当时葡萄牙领属的果阿矿山铁矿石的供应,以及朝日玻璃公司打入印度市场,就是其典型的例证。然而,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同东南亚各国赔偿条约的签署以及印度经济发展的停滞,日本企业的活动重点便从印度转移到了东南亚。

第三章,主要考察60、70年代日本企业的活动状况。这个

时期的主要特征在于,日本国内提出了建设“亚洲经济圈”的构想,旨在实现这一构想的动向使得日本的政界、财界乃至学术界都空前地活跃起来。企业界在经历了 50 年代的赔偿活动和 60 年代的贷款活动以后,也从 70 年代开始以直接投资形式积极展开了经营活动。另一方面,随着日本企业活动的活跃,当地的反日情绪也在不断高涨。1974 年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时,就爆发了以泰国和印尼为中心的大规模反日运动。之后,由于“日本式经营”的推行和企业本身的努力、政府机构的活动、亚洲地区军事政权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限制言论自由制度的强化,在 1977 年福田纠夫访问东南亚时,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反日运动。

第四章,探讨 70 年代到 80 年代前半期亚洲经济飞速增长的问题。这一时期,韩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令人瞩目。本章拟就其发展动因作进一步探讨。其中,重点考察土地改革、锐意进取型官员的出现、企业集团的形成和精干企业家的出现等内部因素,以及 70 年代初爆发的越战、1972 年石油危机爆发后中东市场的拓展等国际因素,从而指出正是这些复合因素的作用促成社会阶层的变化与重组,才使这种发展形成体系而固定化。

第五章,以泰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为线索追溯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初东盟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同日本企业的关系。80 年代后期,东盟地区快速实现了工业化。本章在阐述该地区整体工业化与日本的关系之后,以具体的企业为例,对泰国的汽车工业进行个案分析,同时理清其与一级供应商(Supplier)和二级供应商的关系,从而探求日本企业开展的活动对泰国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第六章,重点讨论 90 年代前期日本汽车产业在东盟的活动状况。虽然日本企业在亚洲的支柱产业有汽车和电机两个行业,但本章把论述重点放在其中的汽车产业方面,就该行业内日本企业同欧美企业之间的竞争、日本企业所推进的“亚洲车”构想、BBC 与 AICO 方案的推行以及当地商品技术供给商的发展情况等进行分析。此外,还要探究日本企业在基于“盯牢美元”的模拟稳定外汇制度下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体制。

第七章,以马来西亚为例,考察 90 年代前期日本的电机产业在东盟内的活动状况。具体而言即以槟城为主要对象考察日本的电机产业打入马来西亚后对当地城乡生活状况及妇女劳动力的影响。日本的电机产业在马来西亚的发展,扩大了当地妇女的劳动就业机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这里将从就业、工作、日常生活、婚姻以及家庭关系等方面展开分析。

尾章,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地制造行业的生成与变化进行评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泰铢暴跌后出现的金融危机中,在基于“盯牢美元”的模拟稳定外汇兑换制度的前提下,于 90 年代以前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体制已经发生动摇,新的分工体系亟待形成。

通过本书的分析,希望能使读者从中看到,始自 1997 年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战后日本在东南亚创建的生产体系弱点的反映,并由此认识到要想弄清这次金融危机给制造行业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去探明相应的历史背景。能如是,笔者将倍感欣慰。

注 释

① 竹中平藏:《日本贤国论》,电通社,1993 年。

②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11/12,

1994.

- ③ Steven Radelet and Jeffrey Sachs, "Asia's Reemergence", *Foreign Affairs*, 11/12, 1997.
- ④ 《日本经济新闻》, 1998年10月2日。
- ⑤ 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大原进译), 日本经济新闻社, 1999年。
- ⑥ 在论及亚洲金融危机和亚洲产业之间关系的为数不多的论文中, 有文章探讨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与产业的关系, 尤其着重探讨了中国和韩国的相应对策("OECD, *Asia and the Global Crisis The Industrial Dimension*", Paris, 1999)。
- ⑦ 关于日本企业的海外活动, 有角度不同的分析方法: 一是从跨国企业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企业活动; 二是从日本企业的海外活动状况出发来分析日本企业的活动; 三是从经营史或公司史的角度分析日本企业的海外活动。前两种方法的缺点在于它们局限于孤立的现状分析, 缺乏历史的角度。笔者对日本企业海外活动状况的分析视角, 与第三种方法最接近。因此, 本书可以定位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的海外发展史篇。但是, 迄今为止的经营史或公司史, 大多带有浓厚的个别企业或个别产业史的色彩, 很少就跨国企业或日本式的经营进行深入探讨。其最好的佐证就是, 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后, 没能从海外发展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但是, 自野口悠纪雄的《1940年体制》(东洋经济新报社, 1995年)出版以来, 对日本经营体系的历史探源以及战争前后的“连续”与“间断”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热点。例如桥本寿郎编著的《日本企业体系的战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6年); 安冈重明等编著的《日本经营史》(岩波书店, 1995年); 小林英夫等编著的《日本株式会社の昭和史》(创元社, 1995年)以及拙著《日本株式会社の创始人——宫崎正义的一生》(小学馆, 1995年)。

如果从日本企业在海外活动状况的角度来考察上述课题的话, 则

必须考察战前的物质资产(社会资本、企业设备)、人才、社会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等对战后的影响(金子文夫的《殖民地统治》,收于大石嘉一郎编《日本帝国主义史》3,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第433页),因为这种战前状况对战后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参照本书第一章)。但是,除了以日本工营为代表的技术开发活动外,很多都缺乏连续性,新的结构体系是在50年代以东南亚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笔者的结论大致接近于末广昭的《经济再打入的历程》(中村政则等编《战后改革及其遗产》,《战后日本的占领与改革》第6卷,岩波书店,1995年)。